



西方文化叢書
高宣揚◎主編

4



拉康結構主義 精神分析學

杜聲鋒◎著



西方文化叢書
高宣揚◎主編

拉康結構主義 精神分析學

杜聲鋒◎著

4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西方文化叢書

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

4

西方文化叢書

策劃 潘耀明
執行編輯 唐一國
主編 高宜揚
副主編 黃鳳祝
編輯顧問 梁漱溟 洪謙 勞思光 劉述先
章政通 葉啓政
責任編輯 林道群
裝幀設計 陳栩椿
版面設計 陳正益

書名 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 (西方文化叢書④)

著者 杜聲鋒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刷 優文印刷廠

臺北市汕頭街54巷42弄55號

版次 1988年10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32開 (130×209mm) 216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 · 04 · 0659 · 1

© 1988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作者◎簡介

杜

警

鋒

一九六二年生，河南南陽人。一九七九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一九八三年畢業後考上公費留法研究生，一九八四年七月就讀於巴黎第一大學，現在該校攻讀哲學博士學位。主要著作有《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皮亞傑及其思想》；近年來還繼續發表論文十餘篇，包括：〈略論現代西方對歸納邏輯的研究〉（載《江漢論場》）、〈巴什拉爾的科學哲學述評〉（載《法國研究》）、〈保爾·李克爾的解釋學的現象學〉（載《世界哲學年鑑》）等；另有譯著《現象學與人文科學》（香港天地圖書公司）。

總序

作為整個世界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西方文化是人類面對自然和歷史的挑戰而自我確立、並不斷鞏固其優越地位的經驗總結。梁漱溟先生在其《人心與人生》一書中，對世界各種文化進行比較研究時指出：“我們不能不承認人類現代文明實從歐美發端後乃擴展到全世界的……。”

近百年來，特別是自嚴復和梁啟超以來，先進的中國學者不斷地試圖在保存和發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將西方文化之精華逐步地介紹到中國來，以期加速中國新文化之建設，推動整個社會現代化之進程。魯迅先生早就洞察到中國民衆之愚昧對於社會改造所起的消極作用。因此，他在痛斥時弊的同時，也時時不忘大聲疾呼引進西方先進文化之必要。

《西方文化叢書》在學識淵博的老一輩學者，特別是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致力於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梁漱溟先生的關懷和指導下，以系統論述西方文化界哲學、文學、史學、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美學等各個學術領域的重要理論成果為宗旨，力求通過深入淺出的文字，來介紹西方各國各個歷史時期，特別是當代有影響的思想家、理論家、文學

藝術家的作品及流行的社會思潮，內容簡明扼要，豐富多彩，是一套具學術價值的普及性讀物。

本叢書的作者以海內外學有所成、富於創見的中年學者為主，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以及移居或留學歐美的專家們，他們將以多樣不拘的選題及流暢活潑的文筆，從各個方面，盡可能準確地介紹西方文化之精華。我們希望，在海內外廣大作者和讀者的支持下，這套不限卷數分期分批出版的獨立專著，終將從整體上構成一部有關西方文化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文庫，為社會各界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提供有益的精神養料。

高宣揚 謹識

一九八七年聖誕節前夕於巴黎

序 言

追求真理比佔有真理更重要。

——萊辛

來法讀書已三載有餘了。初到法國時，便對“結構主義思潮”(structuralisme)有興趣。一是由於無論從哪方面說，結構主義都是法國乃至西方現代的重要思潮之一；二是由於結構主義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方法，因此它可以被運用於廣泛的人文科學領域：文學評論、心理學、精神分析學、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馬克思學、倫理學、哲學等，而我很早就對這些學科抱有濃厚的興趣，所以便想通過結構主義這個“聚焦點”對這些人文科學作較深入的學習與研究。因此，研究結構主義對我來說有兩種意義，一是研究其思想與方法本身；二是擴大視野，在人文科學思考與研究方面打下一個堅實而又較廣博的基礎。

治學方法因人而異，有人強調由專而博，有人主張由博而專，前者可稱為從樹木到森林，後者可稱為從森林到樹木。我認為，兩者都好，既見樹木又見森林是整體觀念的體現。但我的性情更近於後者，即先見森林，再究樹木。當然這樣做是有危險的，有可能廣而空，一無所成。但是，只要努力，什麼事又都是可能的。我常用如下比喻來鞭策

自己：能走一百步路的話，決不在九十九步時停頓下來……。

在法讀書，從客觀條件上講，對了解西方文化真是“近水樓臺”，但主觀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我常感慨時間之珍貴，精力之有限，對於別人總有那麼多時間用來消遣，感到迷惑不解。我想在西方讀書期間，盡量多而廣地學習和了解西方文化的精華，回國後再補一補中國文化這一課，縱橫求索，看看是否有所成？

本書倉促寫成，對拉康思想的費解之處的理解與闡述有不少局限；由於篇幅所限，加之又不得不較詳細地介紹一下有關的基礎知識（如結構語言學，佛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等），所以連拉康的許多重要理論（如性關係、無意識與主體等之間的關係、關於精神分析的治療法、文學評論觀、倫理學觀、論哲學語言等）都無法獵涉，這是一個缺憾，希望有一天能回頭來對這些問題詳加討論。

我幼年喪父，由母親艱難地撫養長大。小時候母親常告誡我：“寧與別人比種田，不與別人比過年”。語言樸素，哲理深刻；銘記於心，從不敢忘。今願以這本不像樣的小書獻給她老人家！

本書的寫作得到Saen-Yang Kha教授的鼓勵與幫助，謹表謝意！

杜聲鋒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於巴黎西南
郊區的木城(La ville du Bois)

〈引論〉

拉康與結構主義：什麼是結構？

“結構”是一個新詞，誰也沒有對它明確地加以定義過，但它卻一直在被濫用著。

——羅蘭·巴爾特

結構主義主要地乃是一種方法……；結構主義的確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學說……。

——尚·皮亞傑

六十年代初，在法國思想界出現了一股強大的人文科學思潮，這股思潮開誠佈公地宣稱它是與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統治法國哲學界近二十年之久的現象學與存在主義思想相對立的，由於屬於這個思潮的思想家們都是在“結構”(structure)或與結構相鄰近的概念(如福柯的“知識型式”[épistémé])的旗幟下從事自己的具體研究，因此該思潮被稱為“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e)，屬於該思潮的思想家們便自然被稱為“結構主義者”(structuralistes)了。

但是，與其他“主義”（如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托瑪斯主義等）不一樣，結構主義不是一個學派，不是一種學說，因為它沒有一個成文的（如本世紀初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那樣）或不成文的（如存在主義）共同研究綱領和主張；籠統地講，可以說結構主義是一個思潮；具體地說，“結構主義主要地乃是一種方法”。①由於結構主義是一種方法，所以它可以被運用到廣泛的自然科學、數學科學、邏輯科學和人文科學之中去。但我們這裏講的結構主義，主要是指人文科學中的結構主義。

從歷史發展順序來看，首先有語言學的結構主義，即起於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年)，經過雅可布遜(Roman Jakobson, 1896-1982年)、本伏立斯特(Emile Benveniste, 1902—)、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馬廸耐(Andre Martinet, 1908—)等人發展起來的現代語言學結構主義或結構語言學。索緒爾在他的《普遍語言學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書中，把語言學分為外部語言學(*la linguistique externe*)和內部語言學(*la linguistique interne*)：

外部語言學可以把各個細節一件件地堆集起來而不致於感到被系統(*système*)的老虎鉗鉗住。例如每個作者都可以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把一種語言在它的領域以外擴展的事實歸類；他如果想要找出是什麼因素在

各種方言面前創造了一種文學語言，常可以採用簡單的列舉法；如果他把事實安排得有條理，那只是爲了眉目清楚的需要。

至於內部語言學，情況卻完全不同：它不容許隨意安排，語言是一個系統(système)，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把它跟國際象棋相比，將更可以使人感到這一點。在這裏要區別什麼是外部的，什麼是內部的，是比較容易的：國際象棋由波斯傳到歐洲，這是外部的事實，反之，一切與系統和規則有關的都是內部的。……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變了系統(système)的，都是內部的。②

索緒爾這裏講到的“內部語言學”，實際上就是日後的“結構語言學”。索緒爾雖然沒有使用“結構”(structure)這個概念，而是使用的“系統”(système)概念，但根據索緒爾對“系統”概念的規定，我們可以說在他那裏“系統”與“結構”是等價的。而且，索緒爾還提出了一些後來成爲結構主義方法的重要規則的理論，例如，與歷時語言學(linguistique diachronique)相比較，他更強調共時語言學(linguistique synchronique)，這就是後來結構主義的一個重要規則，即共時態(synchronie)優於歷時態(diachronie)。索緒爾說：

有關語言學靜態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時的，有關進化的一切都是歷時的。同樣，共時態和歷時態分別指語言

的狀態(état)和演化的階段(phase d'évolution)。③

簡言之，共時態是指“能指”(signifiant)系統的研究與時間的變化無關；而歷時態的研究則只考慮由時間變化引起的系統從一個狀態到另一個狀態的變化，即以轉換的規則(règles de transformation)來研究歷史變化。所以皮亞傑說：

狹義的語言學結構主義，肇始於索緒爾；他證明語言的過程並不能歸結為語言的歷時性研究，例如一個詞的歷史，時常與說明這個詞的現時的意思相去甚遠。其原因是除了歷史之外，還有一個系統(système)的問題(索緒爾沒有運用過結構(structure)這個術語)，而這樣一個系統主要是由對這個系統中各種要素都發生影響的平衡規律組成的，在歷史的每一個時刻，這些規律都取決於語言的共時性。事實上，在語言中起作用的基本關係，就是符號與意義之間的對應關係。種種意義合成的整體，便自然地形成一個以區分和對立關係為基礎的系統，因為這些意義之間是有聯繫的；而且還形成一個共時性系統，因此這些意義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係。④

顯然，索緒爾已經指出了結構(系統)的“整體性”。

索緒爾又說：“語言是一個純粹的價值系統，除它的各項要素的暫時狀態以外並不取決於任何其他東西”。“語言

是一個系統，它只知道它自己固有的秩序。”索緒爾已指出了結構（系統）的“自足性”和“自我調節功能”。

索緒爾還認為：語言是由能指(signifiant)與所指(signifié)組成的一個符號系統；能指（音響形象）與所指（思想觀念）之間的關係是約定俗成的，並不具內在關係，所以語言符號可以是任意的。拉康從符號的任意性出發導出能指較所指具有優越性的觀點，這是拉康“無意識像語言一樣被結構化”的觀念的直接理論參照。

索緒爾如上的觀點，對日後的整個結構主義方法，有極大的影響；不懂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不可能弄懂後來的各種結構主義思潮。

從人類學方面打開缺口，把結構方法引入人文科學研究中，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 1908—)是先驅，他所運用的結構方法，除了受到索緒爾的結構方法和音位學結構方法（如雅可布遜的理論，列維·斯特勞斯是四十年代初在美國遇見雅可布遜後才接受結構主義方法的）影響之外，他還在不同的親屬關係組織中找到了轉換網和群等代數結構，他在韋伊(A. Weil)和吉爾博(G. th. Guilbaud)等數學家的幫助下，甚至試圖把這些結構予以形式化。從下面兩段話我們可以大致看到列維·斯特勞斯對“結構”一詞的理解：

如果像我們所相信的那樣，精神的無意識活動就是給內容規定一些形式，而如果這些形式對一切人的精神，

無論是古代人或現代人，野蠻人或文明人，都基本上是共同的——就像對於言語活動中表現出來的象徵功能所作的研究結果輝煌地表明的那樣——那麼就應當，而且也有充分的條件在每一種制度與習俗下面去找到這種無意識的結構，來得到能行之有效於其他制度習俗的解釋原則；當然，條件是要深入進行分析⑤。馬克思主義——如果不是馬克思本人的話——常常這樣理解，似乎種種實踐(les pratiques)是立即從“實踐活動”(praxis)中產生的。我們並不懷疑(經濟)基礎具有不可否認的第一性，但我們以為，在“實踐活動”與實踐之間總存在著一種中介，就是概念圖式；一個是物質，一個是形式，雙方都失去了獨立的存在，而通過概念圖式的運算合成了種種結構，也即同時既是經驗性的又是可理解性的種種存在實體。我們願意在馬克思開闢的這個關於上層建築的理論上作出貢獻……⑥。

具體說來，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方法有如下規則：

- (1)對整體性的要求(l'exigencé de totalité)；
- (2)整體優越於部分(priorité du tout sur les parties)；
- (3)內在性原則(le principe d'immanence)即結構具有封閉性，對結構的解釋與歷史的東西無關；
- (4)用共時態反對歷時態，即強調共時態之優越性

(synchronie contre diachronie)；

(5)結構通過差異而達到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é)；

(6)結構分析的基本規則：

(a)分析應是現實的(réelle)；

(b)分析應是簡化的(simplificatrice)；

(c)分析應是解釋性的(explicative)。

如此等等。⑦列維·斯特勞斯在對親屬關係、神話、文化現象、婦女交換、財富交換和語言交換的研究之中，都具體地運用了以上規則。

有了索緒爾（後經雅可布遜等人發展）的結構語言學方法，和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方法，結構主義方法體系便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為人文科學運用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鋪平了道路。

結構主義思潮從本世紀初“俄國的形式主義”(Russian Formalism)，經二、三十年代“捷克的結構主義”(Czech Structuralism)，二次大戰前“結構主義”思潮隨著雅可布遜等人的遷居而傳入並興盛於美國，四十年代末由於列維·斯特勞斯的努力（他的第一部偉大著作《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發表於一九四九年），結構主義又返回歐洲大陸的法國，並於六十年代達到它的頂峰，遂被稱為“群星燦爛”的年華。⑧

在法國思想界，六十年代是結構主義的黃金時代，“一

九四五、一九六〇：想把握這兩個日期之間所經歷的路徑，只須翻開一份報紙和雜誌看一下其中的書評就行了。……人們不再談論‘意識’與‘主體’了，而大談‘規則’(règles)、『信碼’(code)、『系統’(système)等。人們再不是存在主義者，而是結構主義者了”。⑨一時間，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阿爾杜塞和哥德尼埃[M.Godelier])、思想史研究的結構主義(福柯)、文學評論的結構主義(羅蘭·巴爾特，多朵羅夫[Todorov])、哲學結構主義(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德勒茲[Gilles Deleuze])當然還應加上列維·斯特勞斯的“人類學結構主義”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學的結構主義”，真是群星燦爛，“結構”輝煌！

拉康在六十年代以前實際上就成了結構主義者，例如人們通常把他一九五三年的著名的“羅馬講演”和《言語和言語活動在精神分析學中的功用與範圍》(*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 en Psychanalyse*)作為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的宣言書。在該文中，拉康對結構語言學和列維·斯特勞斯的人類學所使用的方法大加讚賞。拉康已認為語言與象徵是“人類活動的基礎”，他已經以列維·斯特勞斯的“能指系統的獨立性”(autonomie d'un système signifiant)理論為參照，把無意識與言語活動、象徵功能等結合起來一同研究。只是到了六十年代，結構主義運動轟轟烈烈地佔領了法國人文科學領域後，拉康的思想才時髦起來，為人熟知，拉康也才得以在